

2011年法国
费米娜文学奖获奖作品

痛及心灵的爱情悲歌

生命里最动人的
回忆，不过是些
爱的碎碎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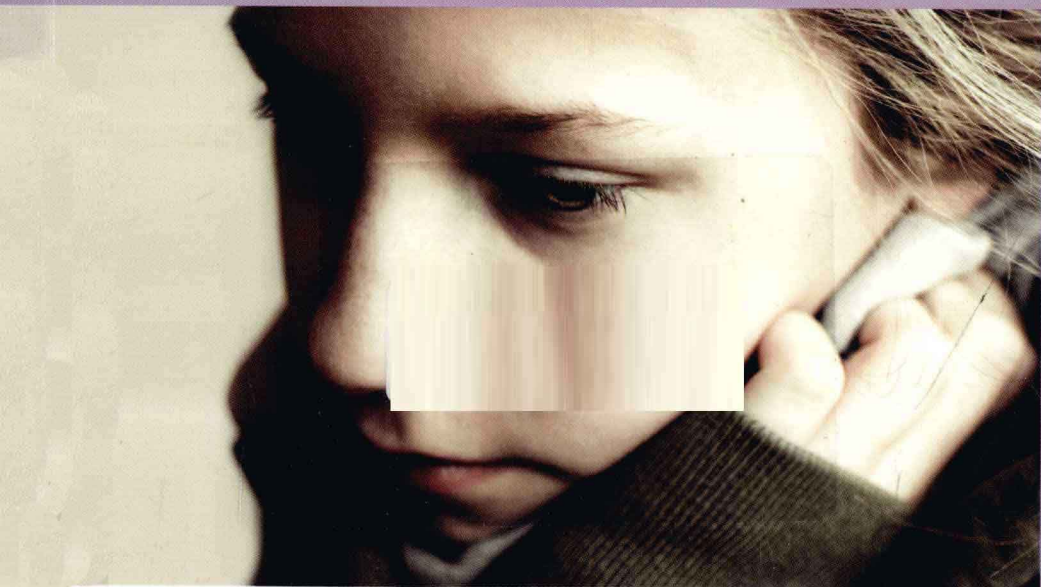
[美]弗朗西斯科·高德曼◎著

杨扬 子文◎译

S a y H e r N a m e

你走以后，还有谁会让我一生牵挂？

念及她名



CTS

湖南文艺出版社

南来天卷
CY BOOK

[美] 弗朗西斯科·高德曼◎著

杨扬 子文◎译

念及她名

S a y H e r N a m e



CS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博集天卷
CS-BOOKY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念及她名/ (美) 高德曼 (Goldman, F.) 著; 杨扬, 子文译.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2.1

书名原文: Say Her Name

ISBN 978-7-5404-5251-3

I. ①念… II. ①高… ②杨… ③子…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250618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8-2011-245

Original Title: SAY HER NAME

Copyright © 2011 by Francisco Goldman

Copyright licensed by Grove/Atlantic, Inc. arranged wit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念及她名

作 者: [美] 弗朗西斯科·高德曼

译 者: 杨 扬 子 文

出 版 人: 刘清华

责任编辑: 丁丽丹 刘诗哲

监 制: 孙淑慧

策划编辑: 马冬冬

版权支持: 李彩萍

版式设计: 崔振江

封面设计: 张丽娜

出版发行: 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 410014)

网 址: www.hnwy.net

印 刷: 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字 数: 273 千字

印 张: 11

版 次: 2012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04-5251-3

定 价: 29.80 元

(若有质量问题, 请致电质量监督电话: 010-84409925)

2007年7月25日，奥拉永远地离开了我。她周年忌辰那天我回到了墨西哥，回到了太平洋海岸的那片海滩。我觉得这一天应该在事情发生的地方度过。现在，短短一年时间之中，我要再次孤身一人返回布鲁克林。

2007年4月24日，奥拉离世前三个月，她刚刚度过了三十岁的生日，而我们结婚也仅有一年零三百三十九天。

奥拉的母亲和舅舅都指责我应该为奥拉的死负责。的确，奥拉的意外我难辞其咎；即便他们俩坚持的理由我难以苟同，但如果我是胡安妮塔的话我也会想把自己送进监狱。

奥拉的舅舅莱奥博德打电话告诉我奥拉的母亲要起诉我，而他将作为此案的代理律师。他还跟我说：“如果你还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就写信好了。”从此以后，我们俩再也没有说过一句话。



奥拉，

奥拉和我，

奥拉和她的母亲，

奥拉的母亲和我。

这是一个爱恨交织的旋涡，抑或是……

我的爱人啊，这一切真的发生了吗？

美西螈在哪儿？

在我们将从墨西哥机场起程之际，当夜幕降临奥拉从她母亲的公寓起身回家的时候，甚至她们俩吃完饭从餐厅离开各自回家之前……只要是她们俩行将分开，奥拉的母亲都会在她面前画着十字，悄声祈祷，请求瓜达卢佩圣母庇佑她的女儿。

美西螈是一种一生都不会完成变态过程、始终保持幼虫形态的蝶螈；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它就像是永远变不成青蛙的蝌蚪。这种动物在古墨西哥城周围分布极广，也是阿兹台克人很喜爱的食物。据说时至今日在霍奇米尔科的咸水运河里还残存着一些美西螈，但实际上即便在那里美西螈也几乎已经绝迹，只有在水族馆、实验室和动物园里才能觅得它们的踪迹。

奥拉非常喜欢胡里奥·科塔萨尔的一则短篇小说，故事讲述了一个对巴黎植物园里的美西螈痴迷至深、最后自己也化身成美西螈的人。故事中，这个无名的人每天都会造访植物园，有时候一天能去上三回。去了之后他只做一件事情，那就是对着玻璃柜里那些

奇特的小生物出神。它们有着透明的乳白色皮肤，像蜥蜴一样精巧的尾巴，粉红色扁平的阿兹台克式三角形面孔。它们的脚趾形似人类的脚，四足小巧精致；它们的鳃上有着奇特的红色突起；它们的眼睛闪耀着金色的光芒。平常它们几乎一动不动，只是不时地鼓动一下鳃或是突然抖动身体稍做游动。它们看上去那么的奇妙和陌生，让他觉得它们不仅仅是动物，而是和他自己有着某种神秘莫测的联系的同类。有一些秘密被禁锢在它们的身体里，但它们却能用金色的眼睛向他传递信息，似乎在祈求他的拯救。这一天，他像往常一样把脸贴在柜子的外面注视着水中的美西螈，可到了这个句子的中央，却忽然变成了“我”在水族柜里透过玻璃看着外面的那个人——故事的叙述角度就这样发生了变化。在故事的结尾，美西螈期盼着它的心声已为他所知，希冀着他们无言的孤寂之间搭起了一座桥梁。它想象着他之所以不再来植物园是因为他已经去了另一个地方，在那里静静地写着故事，向人们讲述世界上还有一种叫做美西螈的生命。

奥拉搬来和我同住之后第五个月，我们俩第一次一同去往巴黎。奥拉最想做事情莫过于去巴黎植物园看一看科塔萨尔故事里的美西螈。她之前去过巴黎，但是她读到科塔萨尔的故事不过是最近的事情。当然，我们来巴黎绝不只是来寻找美西螈，此行的主要任务是奥拉在索邦大学的面试，当时她正考虑从哥伦比亚大学转到索邦大学。我们到达的第一天下午就去了植物园，然后买票进了园中那座始建于19世纪的动物园。两栖动物馆入口处贴着一张海报，上面用法语印着两栖动物和濒危物种的信息，配了一幅美西螈的侧面图像，凸显出它红色的鳃、欢快的天外来客般的面容和白化病患一样的四肢。进到馆



内，屋子四周的墙壁上嵌着一排有灯光照亮的长方体水族柜，每个柜子里都有不同的潮湿环境：苔藓、蕨类、岩石、树枝、水池……我们俩挨个寻找，阅读着名牌上的信息：各种各样的火蜥蜴、蝾螈、青蛙……但就是没有美西螈。我们生怕不小心将它漏掉，于是又在屋里转了一圈，但依然没有发现。奥拉不甘无功而返，她走到那个身穿制服的中年警卫面前，向他询问美西螈的去处。遗憾的是他对美西螈也是一无所知，但奥拉的表情似乎令他有些动容。他让奥拉稍等，然后转身离去。过了一会儿，他和一个年纪更小、穿着蓝色实验室外套的女士一起回来了。她和奥拉用法语悄声地交谈着，虽然我不知道她们在说些什么，但是那位女士的表情却是欢快而又和善的。当我们迈出两栖动物馆大门的时候，奥拉怔怔地在原地站了好一会儿。她对我说那位女士还记得美西螈，甚至还说有些想念它们。但是多年以前它们就被带走了，现在应该是在某个大学的实验室里。那时奥拉穿着炭灰色的羊毛外套，系了一条白色的羊毛围巾，几缕直顺的黑发略显凌乱地搭在她温润的面颊上，尽管天气还不算十分寒冷，但她的脸蛋却像是身处酷寒中似的一片通红。眼泪，没有奔涌；只是几滴泪珠。温暖咸湿的泪水从奥拉的眼眶中溢出，滑落，湿润了她的面颊。谁会为这种事情落泪呢？我还记得自己当时的想法。我亲吻着她的泪水，呼吸着她略带咸味的温暖气息。在植物园没有找到美西螈竟会使得奥拉如此伤感，这是为什么？不管原因何在，像科塔萨尔故事结尾那只美西螈希望那个人能写篇故事向世人讲述一样——那都是一个谜。而我一直希望能够理解奥拉的感受和心情。

她在笔记本上写下：

美西螈在哪儿？——它们在哪儿？

奥拉身披多项奖学金的荣耀来到纽约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西班牙语文学博士，这其中包括富尔布莱特奖学金和墨西哥政府的奖学金。到纽约六个月之后，奥拉搬到布鲁克林和我同住。此后我们住在一起将近四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时，她和一个学习植物学的韩国留学生一起住在学校提供的宿舍里。在把奥拉的东西搬到我那里之前，我只去过她的宿舍两三次；那间公寓有一处长而狭窄的门厅，两个卧室和一个客厅。学生宿舍自然塞满了学生的物件：宜家的书架，一套炭黑色的不粘锅具，一个红色的布袋椅，一套音响，一个同样购自宜家的小工具箱，连包装还没拆掉。地板上铺着一张毯子，上面堆满了衣物。眼前的一切勾起了我对大学时光和青葱岁月的深切怀念。我迫不及待地想和她在那张凌乱的床上欢爱，但是她害怕室友会突然出现，于是我只好作罢。

虽然奥拉和她那位室友相处甚欢，但我还是无情地把她带走了，留下了那个韩国女孩孤身一人。不过，不到一个月之后，奥拉似乎已经下定了和我在一起的决心，于是她又给那个韩国女孩找了个伴。这次是个俄国女孩，样子应该会招那个韩国女孩喜欢。

学校的公寓在119号大街的阿姆斯特丹大道，位于校园的边缘地带。住到布鲁克林之后，她几乎每天都要坐至少一小时的地铁才能到哥伦比亚，而且都是在交通高峰期。她可以坐地铁六号线，然后在14号大街转车，不过那里的转车楼梯和通道像迷宫一样，在冬天尤其阴森冰冷，奥拉必须穿过迷宫到二号和三号快轨，才能在96号大街转到当地的地铁线。或者她也可以先从我们的公寓步行二十五分钟到市政厅直接坐二号或三号快轨。最终她还是倾向于第二套方案，因此每天早上她都要先步行一段路。冬天里天气酷寒，这一段步行的路可是非



常艰辛，尤其是她还坚持只穿那件羊毛外套。后来我终于说服她让我给她买了一件蓝色的带帽外套，把她从头到脚包了个严实。我说亲爱的，穿这个不会显胖的，尤其是你更加不会。是个人穿上这身衣服都会像个移动睡袋，谁又会在意呢？又暖和又舒服不是更好？她穿上这件衣服，掀起帽子，把衣领拉紧，只剩下一双黑眼睛露出来眨巴着，那样子活像一个装在婴儿袋里的小家伙。从那以后，她只要出门必定会穿上这件衣服。

在这段上学的路上还有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她经常会迷路。她沉迷在自己的书本、思想和音乐中，总是会心不在焉地坐过站，或是坐错了方向，直到深入布鲁克林的腹地才反应过来。这时候她会在某个我从没听说过的地铁站用公用电话打给我：“亲爱的，我现在在比弗利路站，我又坐错方向了。”她的声音异常淡定，根本没当一回事。她不喜欢因为在地铁走错路或者是在社区内迷路被我取笑，但是我有时确实难以抑制。

从奥拉搬到布鲁克林的公寓直到她最后的岁月，除非她骑自行车去市政厅，不然我几乎每天早上都陪着她走到地铁站。尽管那段路程不算很长，但是布鲁克林市区那些无家可归的醉鬼和瘾君子总是偷她的自行车车座。如果遇到雨天或者出门太迟她也会打车过去。要不就是有时候时间已经很晚，而我还在磨蹭收拾、吆喝着让她等等的时候，她会撤下我像阵风一样冲出门去。还有几次她正在为些琐事跟我生气，肯定不会愿意跟我一起走。

通常我都会陪着她走到六号线波尔根站或者是市政厅，后来我们俩商量后决定我只陪她走到弗兰达街那个法国人的熟食店。毕竟我还有工作要做，不能每天耗费一小时往返于地铁站之间。不过有时候她

还是会花言巧语哄劝我陪她多走一程直到亚特兰帝克大道，甚至是直接走到市政厅，有时候不知不觉就走到了哥伦比亚。如果到了这个份儿上，我就只能在巴特勒图书馆泡上一天。几个学期之前我在哥伦比亚教过一个写作培训班，还留着那时的ID卡。我会在图书馆读读书或者在笔记本上写点东西，要不就在电脑室查查邮件，读读在线报纸打发时间，通常都是先看《波士顿环球报》的体育版（我是在波士顿长大的）。通常我们会在奥利餐厅吃午饭，然后去吉姆音像店烧烧钱，或者在迷宫书店浏览书籍，出门的时候总是会拎着大包小包，其实回家之后根本没有时间读。有时候即便是她早上没有说服我跟她去哥伦比亚，到了中午她还是会打电话让我赶过去和她一起吃午饭，半数情况下我还得奉命前往。

奥拉会对我说：“弗朗西斯科，我结婚可不是为了一个人吃午饭，我结婚可不是为了一个人过日子。”

如果我们俩一起步行前往地铁站，一路上大部分时间甚至全部时间都是奥拉在喋喋不休，她会跟我讲她的课堂、她的教授、其他的学生、她对某个短篇故事或者小说的新观点，还有她的母亲。甚至当她神经特别紧张，非常焦虑的时候，我还是会努力鼓励她或者是重复她之前的话。但是当她情绪不错的时候，她就像只小猫似的每走几步就会在我的嘴唇上舔一下，真是令人喜不自胜。如果我没有牵着她的手或者当她想要我搂着他而我却不解风情的时候，她向我抱怨的样子也是那么可爱。

我确实喜欢每天都有这样的小幸福，但是我也有所忧虑，身边有一个每天要我陪她走到地铁，又总是引诱我跑到哥伦比亚跟她吃饭的女人，我什么时候才能完成下一本书呢？



直到现在走在路上我还时时幻想着奥拉就走在我的身边，而我就牵着她的手，于是我会不自觉地把手稍稍伸出去。如今的人在街上看到有人自言自语也不会大惊小怪，因为他们会默认这种人是在对着蓝牙设备讲话。但是如果他们注意到那个人眼眶湿润，嘴唇似乎因为悲伤而扭曲的时候还是会显出一丝诧异。我想他们一定很奇怪眼前的这一幕，也会想知道是什么事情令一个人如此悲伤地哭泣。

奥拉离世后第一个秋天里我在布鲁克林史密斯联合大街的拐角看到一个老太太站在对面的角落等着过街。那是一位在社区里平凡无奇的老太太，一头整齐的灰头发，背有些微驼，苍白的面孔却挂着甜美宽厚的表情，看上去在耐心地等待绿灯的同时，她也很享受阳光和十月的秋高气爽。我的脑海里忽然冒出一个念头，就像是一颗无声的炸弹令我的思绪忽然涌动：奥拉永远不会老去，她也永远不会回顾身后漫长的时光。如果奥拉没有被带走，她也一定会成为一个一生充盈的可爱老太太吧？想到这里，我不禁感叹命运的不公。

是注定吗？我是不是注定要走进奥拉的生命，抑或是我闯进了不该僭越的领域，搅乱了注定的安排？奥拉是不是应该和另一个人结合？或许她该嫁给一个哥伦比亚的学生，一个在巴特勒图书馆里坐在离她几个座位之外的人或是一个在匈牙利糕点店里羞涩却又禁不住时时偷看她的人？但除了已经发生的事情之外，还有什么能被称为注定呢？她的自由意志，她对自己作出的选择应负的责任又该如何？绿灯亮起，我穿过了史密斯大街，当我和那个老太太擦身而过的一瞬间，她是否曾留意我的脸庞？我无从知晓，因为我模糊的视线一直停留在人行道上，心中所想的只是赶紧回到我们的公寓里，那是奥拉逗留最久的地方。

我们的公寓在一座四层棕色小楼的一层，我已经租了八年。这栋房子的主人是意大利人，名叫利兹塔诺，他们一家人原来都住在这里，那时候一层是他们的客厅。但现在一层已经变成了我们的卧室。房间的天花板很高，就连换个灯泡我都得使用一架五英尺高的脚踏梯。我站在那架摇摇欲坠的梯子顶端，用力伸长手臂，一面摇摇晃晃地力争保持平衡，奥拉坐在角落的写字台前看着我，讥讽我就像一只笨鸟。在墙壁的最上沿有一圈石膏的飞檐装饰，图案是新古典主义风格的波浪形树叶衬托着玫瑰花纹。两扇又高又深的窗户挂着厚厚的窗帘面向大街，在两扇窗户之间一扇巨大的镜子一直顶到天花板，配着巴洛克式的金色木框，算得上是这间房子里最华丽的装饰。我在镜子顶端两侧的挂钩上拴了一根绳子把奥拉的结婚礼服挂在了镜子前。镜子底部的大理石架子上堆放了一些奥拉的遗物。

奥拉离世后六周，我第一次孤身一人从墨西哥回到布鲁克林，奥拉在哥伦比亚的同学瓦伦蒂娜，还有她们的朋友阿黛儿·拉米雷斯（她正好从墨西哥来美国旅行，和瓦伦蒂娜住在一起）到机场接我，开着瓦伦蒂娜那位银行家丈夫的宝马旅行车。当时我带了五个行李箱：两个是我的，还有三个装满了奥拉的遗物，她的衣服我不愿意丢弃，于是悉数带回，此外还有一些书籍、照片、日记、笔记本和零散的纸张。我想如果那天来接我的是我自己的哥们儿，我们肯定会步行回去，那事情将会大不相同，或许我们会面带疑惑四下张望一番，然后说“咱们去酒吧坐坐吧”。但是我还没来得及把箱子都拎进屋里，瓦伦蒂娜和阿黛儿就已经开始把东西往大理石架子上掣了。她们俩在屋子里横冲直撞，把各种物件翻来覆去，挑挑拣拣，偶尔也问问我的意见，似乎比我更清楚东西在什么地方，该放在什么地方。阿黛儿是一位视觉艺术家，她蹲在大理石



架子前，摆放着各种物件：我们去香港旅行时买回的一顶插着布花的丹宁帽；她最后一次带到海边的帆布书包，里面的东西原封未动：钱包、太阳镜、两本小书（布鲁诺·舒尔茨和西尔维那·奥坎波），还有一把齿间缠绕着她黑发的梳子；一盒我们在墨西哥城的公寓附近的购物广场里买的中国挑棒，奥拉离世前两周我们还带着它去了星期五餐厅一边喝着龙舌兰一边玩游戏；一份刊载着她去年夏天最后一次发表的英语文章的《波士顿评论》；她最喜欢的一双也是唯一一双迈克·雅各布鞋子；一只小小的蓝绿色水瓶；一些零碎的装饰品、纪念品；照片；蜡烛；在一堆物品中单独摆出来的是一双闪亮的粉红底黑白条雨靴。瓦伦蒂娜站在镜子前向我宣告：我想起来了！奥拉的结婚礼服呢？我从橱柜里取出了礼服和那架脚踏梯。

这种事情是我和奥拉经常用来打趣的：一个研究生的宿舍里摆着一个墨西哥的传统祭坛无异于在向人展示陈旧的认同式政治。但是现在做这件事情似乎是正确的，奥拉离世后的一年之中，那件礼服一直摆在那里。我经常会带些花放在花瓶里摆在地板上，再为奥拉点上几支蜡烛。

那件礼服是史密斯大街上一位开女装店的墨西哥设计师为奥拉量身定做的。那位设计师名叫佐伊拉，老家在摩西卡里，我们和她相处得很好。我们经常在她的店里讨论我们想摆个摊卖墨西哥玉米卷给那些半夜从史密斯大街的酒吧里出来的醉鬼饿鬼。我们三个还装做一本正经地讨论加入这项前途无量的商业投资计划。后来奥拉发现“糖果生活”的网站推荐佐伊拉店里的定制结婚礼服比王薇拉的同款礼服要便宜不少而且质量不逊。于是奥拉去了佐伊拉在布鲁克林中心区的工作室，试了三四套礼服，结果每去一次她回到家里都比上一次要焦躁不安。她取回做好的礼服后一开始大失所望，她觉得那件衣服比她想

象得要简单很多，和佐伊拉店里买的普通礼物没什么区别，但是价钱却要贵上四倍。这件礼服是由优质的纯白色棉布制成，只有一些简单的丝绸和蕾丝刺绣稍加点缀，而且礼服的下摆特别宽松，说白了几乎就是一件墨西哥乡村姑娘穿的最简单的长裙。

但是后来奥拉还是喜欢上了这件礼服。或许它只是需要出现在一个合适的环境中，比方说我们为婚礼租的那座农场。它坐落在阿托托尼尔科的一座天主教小村庄，四周都是沙漠，但是这座农场却被仙人掌、灌木丛和一片绿洲包围，在墨西哥时而湛蓝时而灰黄、风起云涌的天空下，弥漫着别样的气息。或许这正是佐伊拉设计的精妙之处：那件平淡得如同一张面巾纸一样的风干的礼服在墨西哥中部高原稀薄的空气中没准真能熠熠生辉。对于8月份在墨西哥小村举行的一场婚礼来说这件礼服真是再贴切不过，毕竟这不过是一个女孩对结婚礼服的梦想。现在这件礼服已经有些微微泛黄，肩带因被汗水侵蚀也变暗了，环绕礼服的蕾丝带子在加宽的地方有些撕裂，露出一个像弹孔一样的破洞，下摆由于在泥地上拖过、在婚礼当晚的舞会上被人踩踏过也有些退色。我还记得那天奥拉脱掉了婚礼时穿的鞋子，换上那双我们在墨西哥城的一家婚庆商店买的舞鞋冲进舞蹈队伍的情形，那双舞鞋就像是护士鞋和20世纪70年代的迪斯科运动鞋的杂交品。这件礼物真是一件脆弱的遗物。夜里，在镜子的幻象和反射出的烛光和灯光掩映之下，在那一圈像金色花冠一样的巴洛克镜框的衬托之下，那件礼服就像是飘浮在空中一样。

由于这座祭坛的存在，或者至少是部分由于它的存在，我们家的清洁工阿姨辞去了这份工作。弗洛来自瓦哈卡，她现在在西班牙的黑



人区养着三个孩子，她每两周来我们家打扫一次。奥拉去世后，弗洛对我说她一来到我们家就忍不住伤心。有一次她来打扫的时候，我看到她跪在祭坛前祈祷，满脸泪水地捧着奥拉的照片亲吻。她跟我说起奥拉称赞她工作的言辞和活泼可爱的声调——“哦，弗洛，你就像是能创造奇迹！”弗洛对我说：“唉，先生，她总是那么快乐，那么有活力，那么年轻，那么好的一个孩子，她总是会关心我的孩子们。”弗洛问我如果她总是止不住哭泣，又怎么能好好工作呢？

她心怀悲伤眼含热泪离开了我的公寓，回到家里去跟她的孩子们诉说了。后来她给我打电话解释说她再也没法工作下去了，对此她深感歉意。我没有再去找其他的清洁工。我想这样她会因为歉意而回来。我试着给她打过电话，想请她回来，但是我听到的留言信息是电话号码已经停用了。不可思议的是几个月之后她确实后悔了，她给我打电话并在留言信箱中留下了电话号码，很显然她是搬家了。但是当我打过去的时候，号码却又不对了。或许是我记错了，毕竟我有些阅读障碍。

现在奥拉已经离世十五个月了，我又独自一人回到了家中，这次没人来机场接我。回到家中，一切和我7月离开时并无二致。床铺一片凌乱。我先是打开了所有的窗户，让新鲜空气进到屋子里。

奥拉的苹果电脑还在她的书桌上。这样一来我可以继续我未竟的工作，把奥拉留下的故事、文章、诗歌，刚开头的小说和其他所有未完成的文字加以整理编辑。这些东西加起来足足有上千个片段，而且散布在奥拉凌乱的文件夹里。我想我可以全身心地投入这项工作。

卧室里的玫瑰早已枯萎，花瓶四周的地板上散落着凋零的花瓣，呈现出凝固的血液一般的颜色，但是花瓶却早已空无一物。而厨房里

奥拉培育的那些植物尽管三个月没有浇水却依然鲜活。我将手指插进一个花盆的土壤里，土壤竟然是湿润的。

我这才想起我给楼上的邻居留了一把钥匙，请他们在我离开期间照料奥拉的植物。我去墨西哥祭奠奥拉离世一周年，本来只打算逗留一个月，但是却待了三个月，而我的邻居一直在照顾这些植物，也是他们帮我清理了那些可能已经腐烂的玫瑰花。他们帮我收了邮件，放在一个购物袋里，摆在了门边的沙发旁边。

我和几个听见我呼救的游泳者把奥拉救上了海滩。我们先是扶她在被海浪冲刷得像沟渠一样的斜坡上躺下，随后又把她抬到平地上让她躺在温暖的沙子上。她挣扎着呼吸，她的嘴不停地张合着，当她需要我为她人工呼吸时，她会呜咽着含混不清地说着“空气”这个词。事实上我并没有完全听清楚她对我说什么，正如我并不清楚地记得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是奥拉的表妹在去找救护车之前听到了奥拉临终的话，后来她又转述给了我。奥拉是这么说的，她留给我最后的话是这么说的：

多爱我一点，我的爱人，
我不想死。

这或许是她说出的最后一个完整的句子，或者说是她的遗言。

听起来是不是很像无罪辩护？我自己是不是不应该说出这样的话？当然，奥拉充溢着感情的恳请和哀求可能会博得陪审团的同情。但这毕竟不是在法庭上。我需要赤裸裸地面对事实，我面对的陪审团是无法愚弄的。一切都是那么重要，一切都是证据。



2

这一切真的发生了吗，我的爱人？难道我真的再次孤身一人回到了布鲁克林吗？在你离开我的这一年里，我曾多少次在午夜凄清的大街上游荡，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徘徊在橱窗前看着那些我早已烂熟于心的菜单，今天我该买哪些外带食物，我该在哪家小餐馆吃饭，我该在哪家酒吧逗留，我该喝上一杯两杯三杯还是五杯才能填满心中的空虚和寂寞？可是在哪里到哪里才能不再感到空虚和寂寞？

我邂逅奥拉之前的五年是我曾经最寂寞的日子。而如今这几个月我才感受到什么是更寂寞更难挨的日子。可是这之间的四年时间我又是如何度过的？在那四年之前我难道因为感受到了爱和快乐，因为得到奥拉给予我的一切而变成了另一个人，一个更幸福的人？抑或我仍旧是原来那个我，只是我获得了无法解释的好运气？四年的时光，对于一个成年人的生活来说是不是过于短暂而无足轻重？抑或这些日子